

学习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专栏

中国式养老的现实定位、关键议题与 转型进路

陆杰华^{1,2}, 谷俞辰²

(1.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老年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多重张力, 对新时期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式养老成为重要的社会命题。而在本土化框架下, 中国式养老不仅是老龄化特殊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的时代产物, 也是实现老龄社会良治善治的关键落点。一方面, 我国人口要素、文化传统、社会体系、发展阶段等国情具有复杂性, 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 也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同质问题, 更有中国本土化的特殊问题。中国式养老在瞄准对象、价值取向、基本单位、时间维度和永续发展等方面与先发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 为推动中国式养老更好地适应新型老龄社会形态, 应从治理依据、治理理念、治理资源、治理工具、治理主体、治理模式等方面着手, 不断调整和创新相关体制机制, 以制度化的政策手段撬动代际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实现全民均等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最终从全人、全代际、全社会、全要素的层面, 打造可持续的中国式养老共同体, 建立共融、共建、共享的全龄友好型社会。

关键词: 中国式养老; 老龄治理; 养老本土化;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24) 05-0001-12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4.00.038

一、研究缘起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新常态, 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2.2亿, 约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6.8%, 即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 超过整体人口占全球人

收稿日期: 2024-07-21; 修订日期: 2024-08-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战略协同研究”(21&ZD189)。

作者简介: 陆杰华,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谷俞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口的比重(19.5%)^[1],我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差异大等特征也日益突出^[2]。在中度老龄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形势下,发达国家的相关养老经验不再具有典型的参考价值,亟须形成本土化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模式。

毋庸置疑,我国养老体系的本土化探索是在“中国式”框架中得到展开和深化的,如养老保险制度从非缴费的福利型向缴费为主的保险型政策转变、从单一部门承责到多部门联动,以及城乡和区域间的差异化探索等^[3]。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后,中央相继提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命题,建设中国式养老体系成为新时代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目标。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未来需要进一步从人口治理转型的背景来深入研究中国式养老的内在逻辑,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整体性方案,扩展中国式养老的治理空间和政策效能,实现老龄人口福祉改善与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化养老特征和理论根基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区域差异大、少子化老龄化并存,且高龄、失能、空巢、独居老人较多,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条件不匹配^[4],养老问题相较于西方国家和东亚其他国家,更加错综复杂。但我国具有敬老孝老的家庭伦理与社会风尚,以及代际和谐、睦邻友好的社群氛围和居住传统,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和基本理论发展中国式养老,成为提高民生福祉、夯实高质量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

1. 中国式养老的特殊国情

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现象和世界性治理议题,从老龄化的内部进程来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高龄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3亿,预测其到2050年将近5亿,届时将占中国总人口30%以上和全球老年人口20%左右,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则将达到1亿人^[5]。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高、中、低方案预测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升速度在2022—2032年期间最快,2033—2040年期间有所减缓,而后再次提速直至2050年并进入高位平台期^[6]。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差异大,人口流出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而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老龄化水平较低^[2]。不过,现阶段我国老年人口结构相对年轻,低龄老年人占比较高,其人力资本不断优化、经济资本更加雄厚,且老化态度和自我认知较为积极,有意愿也有能力继续参与社会、贡献家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较大^[11]。而到21世纪40年代后,婴儿潮期间出生人口会逐渐进入高龄阶段,将积累更多制度性压力。因此,2025—2040年是完善我国养老治理、强化养老资源准备的深刻转型期,要抓住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的机遇期,做好战略储备和政策落地,从而更好地应对21世纪中期严峻的老龄问题。

就老龄化的外部条件而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特殊时期进入老龄化阶段^[8],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与城镇化、工业化、数字化复杂交织,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点显著,“未备先老”和“慢备先老”也对全要素生产力以及医疗照护、社会保障等形成潜在挑战,制约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9]。

因此,我国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同质问题,更有中国本土化的差异问题,导致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应对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养老问题,需要在全方位审视先发国家老龄化道路的同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立足我国老龄化的特殊国情,在超大人口规模和地域范畴中构建更加有效的整体性治理体系^[10],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人口安全、社会和谐稳定,让老年群体得以有尊严地融入社会运行体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基于人口老龄化及其他社会体制机制的特殊国情,中国式养老不仅是对区别于其他国家养老的独特性概括,也是对中国养老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整合^[8]。

2. 中国式养老的理论根基

养老既是个体生命周期的必经阶段,也是国家福利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其模式必然带有鲜明的国情特征和文化特质。中国式养老隐含着历史和现代维度上的个性,不同于西方国家以个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公私边界模糊的“家国一体”理念^[3]。

1997年第52届联合国大会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确定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并提出“全龄友好型社会”或“年龄友好型社会”(Age Friendly World),强调老龄社会是全龄人口共同面对的情况,社会不同的年龄群体、个体人生的不同阶段之间具有天然联系^[5]。中国老年学开拓者邬沧萍先生据此提出“共融、共建、共享”的基本理念,从更为全面、公平的综合性视角出发,探讨在长寿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11],为中国式养老提供了学理层面的理论基础。

“共融”反对代际不公和老年歧视,是不同代际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前提,强调多代人维护共同利益,以融洽和谐的代际关系完成世代交替,实现社会继承和创新。“共建”是共享的必然要求,各代人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平等地参加社会共建,为养老做好多方面的长期储备和资源累积,到晚年时即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及相关权利。尤其是在高龄社会和长寿社会,老年人不仅是当下社会福利的受益者,也是曾经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对老年群体的投资和分配有利于各代际的总体福祉。“共享”则是生存资源、发展机会和社会成果的共享,人们在增龄的过程中,享有独立活动、社会参与、自我实现、人格尊严等方面机会均等的权利,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应激发其造福社会的潜能,使其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自身价值。与此同时,各代人在互惠公平原则的指导下互相投资,不同世代融洽协调,为老龄阶段做终身准备,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因此,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涉及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不同生命周期的社会成员都天然地处于“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中,多代人融洽和谐、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享各种机会和资源的社会就是“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11]。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特别强调统合并对接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治理诉求,构建适应中华文明传统、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治理体系和发展模式,建立起老少共融、代际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三、中国式养老的现实定位与鲜明特征

在老龄化初期,我国往往借鉴先发国家的成功应对经验,但中国的具体国情、文化传

统、社会体系、发展阶段等与其差异较大，需要以中国经验阐释与老年群体相关的人口要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机理，建立本土化的理论话语和实践模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养老的现实定位是：依托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在老年人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完善以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医疗健康为重点的相关制度安排，创造全面支持老龄期生活的社会环境。

基于上述中国式养老的现实定位，笔者认为，中国式养老的鲜明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养老的瞄准对象是异质性较强的老年群体。对于老龄化常态化的超大规模社会而言，老年人口具有特殊的形态特征和变化规律，以及较大的内部异质性和行为模式差异^[3]。一方面，我国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加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通过区域和城乡间的迁移流动传导至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10]。在东西分化和城乡倒置的老龄化格局下，中国式养老的资源安排既要全局谋划，又要重点突破，在着重减轻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压力的同时，利用好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的人口回旋空间，形成更加灵活多元的养老体系。另一方面，受社会经济持续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互联网科技迅速发展的多重影响，老年人对生活照料、专业护理、医疗健康、功能康复等服务内容的需求正趋于分化，对线上线下服务提供方式的要求也不尽相同^[5]。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中国式养老重点关注老年人口内部的代际差异和群体差异，以分类识别需求为基础精准施策，重点回应失能失智、重残、留守、空巢、孤寡等特殊老年人的需求，优先满足其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进而扩展至涵盖生活照料、精神文化、卫生健康等的高水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12]，最终兼顾照护与生产、物质与精神、普惠与差异，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的均衡性和公平性。

第二，中国式养老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目标不仅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也是建构中国式养老体系的基本立场^[13]。传统养老观念普遍以消极观点看待老化过程，将养老行为视作某种社会负担，在这样的观念下，老年人丧失了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中国式养老强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实到老龄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综合提升全社会公共服务与健康保障水平，统筹推进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服务体系以及城乡均衡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相促进、农村和城市养老服务相协同、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基本格局，构建由全体老年人共建共享的优质养老服务^[2]。在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中国式养老着力将民众的养老观念从消极老化转为积极认知、主动健康，推动老年人自身树立自我接纳与肯定的心态，实现对老年人的思想、健康、技能赋能，促进其他年龄群体认识到老年人的价值，减少老龄偏见和歧视，消除快速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焦虑^[14]。

第三，中国式养老的基本单位和主要场域是家庭。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也是生活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联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15]。作为最主要的养老行动场域，家庭不仅发挥中介和缓冲作用，消化大量社会转型成本，避免了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直接挤压^[5]，还天然链接了不同亲缘关系，通过代际互动实现家庭内部照料资源的整合与分配，

以及家庭主义下的代际互惠和整体利益最大化^[3]。因此,尽管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家庭的基本结构,削弱了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但传统孝道文化和代际责任依然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的观念和行为^[16],其在自我发展和家庭利益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形成了个体意识和传统养老观念共存的稳固格局^[17]。家庭内部的传统互助网络同样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子女承担着事实上的主要养老责任和“血缘道义”^[5]。在这一文化语境和生活情境下,中国式养老的推进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其作为制度安排的重点方向和整体对象,在养老相关的政策制定、实施及评估的全过程植入家庭视角,识别老年人及其所在家庭的整体性变迁,通过向家庭而非个体提供支持,实现资源在家庭内部的有效分配。不过,强化家庭的养老角色并不等同于将公领域的养老责任转嫁到家庭,而是在明确家庭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以其为节点统筹政府、市场、社区等多个养老主体的差异化作用,通过资源链接和财政支持来提振家庭的发展能力和养老功能^[10],减轻照顾精力代际分配的赤字问题,实现治理资源和文化禀赋的融合。

第四,中国式养老的时间维度是全生命周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18]。在老龄化这一新型现代文明和社会形态下,老年人不是孤立的人口群体,老年阶段也不是孤立的生命时期,而是与青年期、中年期类似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代际的相关政策都对中国式养老的推进效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用,不同年龄群体应当有意识地树立终身发展的理念,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和资源规划^[3]。在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生命周期的框架下,中国式养老充分尊重老龄化及其引发的全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全面识别老年人口的现实特征和有效需求,强化对老年人口全过程监测的健康维护,提高民众的养老金融规划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在个体层面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财务规划和养老财富管理。同时,中国式养老通过完善生育、教育、就业、退休、养老、医疗、长期照护和老年优待的连续性政策制度体系^[19],推动养老体系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拓展,建设全龄友好型的制度环境,为中国特色的老龄文明赋能^[11]。

第五,中国式养老的永续发展是多层次的制度保障。中国式养老不是独立的应对策略,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战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将其置于国家整体发展框架中进行布局^[20],以多层次的制度保障助推中国式养老的永续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养老政策和制度大多以单一部门为主导,各类政策的优先顺序和实施范畴受到不同领域的职责制约,极易导致部门的权责交叉或政策摩擦。而中国式养老基于公共政策的跨功能性^[10],将整体性视角纳入行政导向的政府专业分工模式中,突破传统体制机制的制约,实现不同维度、不同功能、不同导向的跨部门协同,放大政策合力,建立起涵盖公共服务、老龄事业与产业、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多层次、全覆盖的战略安排和政策制度,统筹区域和城乡的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

四、善治视角下中国式养老的关键议题

随着老龄化成为我国社会的新常态,推动良治善治、构建全龄友好型环境是老龄社会治理的基础^[21]。而在全龄友好的社会里,“良治善治”就是通过调整和转变治理模式,以制度化的政策手段撬动代际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全民均等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不断促进社会成员的共建、共融和共享,打造中国式养老共同体^[14]。

如图1所示,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是建设中国式养老的先决条件,在善治视角下推进中国式养老,首先要明确治理依据,包括对老年和老龄化的界定以及对养老服务的评价标准等。长期以来,我国的养老体系内嵌于国际通用的老年定义和老龄标准,导致养老治理工作陷入对西方框架的回应中,缺乏有效的理论突破和标准革新,如以60或65周岁的静态日历年龄来划分老年人,以人口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等指标衡量社会的养老压力^[7]。然而,我国的人口结构特征、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观念等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随着健康条件的改善和疾病谱的转变,人们进入老年阶段的门槛也在逐渐后移,国际通行的单一指标可能难以反映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际程度,也无法客观测量社会的抚养规模^[22],更不能体现老年人口内部的群体异质性^①,造成对老龄社会的误导性认识。同时,我国的养老体系建设起步晚,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现实情况和具体实践,养老质量评价维度往往直接嫁接国外理论^[13],但不同国家养老治理的内容体系、服务对象和参与主体不同,需要构建适用于中国社会背景和文化特质的评估体系^[3],形成关于老年问题和人口再生产的全新认识,从而提升养老资源利用率,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已有部分研究开始尝试修正相关指标和评价体系^[23],但仍需进一步建立科学反映老化过程和老龄化程度的动态标准,在年龄维度上对“老年”和“老龄”进行再定义,精准识别老年人口的内涵、外延与边界,以此为基础估计老龄社会的真实状态和潜在影响,并对相关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进行深刻改革^[10],以推动养老服务 and 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老龄社会的“善治”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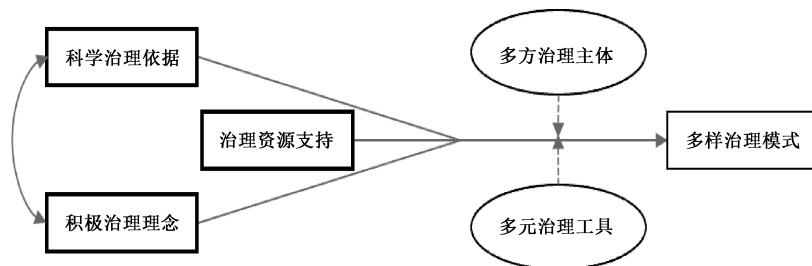


图1 善治视角下的中国式养老共同体示意图

中国式养老治理依据的调整需要治理理念的创新。传统的养老观念大多将老化视为不可逆转的失能过程,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缺乏理性认识,往往夸大其严重程度和社会负担^[19],相应地,我国老龄化的应对策略是短期性和非生产性的,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但老年人不仅是被照料的对象和社会福利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社会生产和家庭再生产领域的重要劳动力^[10],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和活动能力良好的中高年龄老年人,能够自主生活、自我照料,还承担了家庭内部的抚养责任与家务劳动,甚至广泛参与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的养老善治,应彻底改变以年轻人口形态为核心的社会观念,尊重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规律,围绕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②构建中国式

① 自1982年国际标准提出至今,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从67.77岁提高到77.93岁(2020年),且我国老年群体具有鲜明的国情特殊性,仍使用60岁或65岁的通用指标作为进入老年阶段的标准,值得商榷。

②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老龄化”发展战略,提倡构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体系,2002年进一步发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框架》,将健康、保障和参与视为一体,强调以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和生活福祉。相较而言,生产性老龄化理念注重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成功老龄化则旨在减少老化过程中的生理、认知功能衰退,提高其生活质量。

养老的治理理念^[24-25],在更加广泛的社会发展中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提供兜底保障,为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推动民众树立终身发展的理念,在认知上接受老年期只是个体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以自我肯定与接纳缓解老年人的心理压力,改变将老年人口视为风险和负担的传统认知,减少老龄偏见与歧视,消除公众对老龄社会、老化过程和老年生活的过度担忧和负面情绪^[9],形成对老年群体的全新认识。

治理理念能否落到实处,取决于治理资源的支持是否充分,中国式养老的深化落实需要在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进一步激活新型治理资源。一方面,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已经实现从特惠到普惠、从保基本到高层次的目标,各项老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26],但养老服务标准及其监督工作的推进仍然有所滞后,造成养老服务的供需结构不匹配和有限养老资源的过度浪费^[12]。实现中国式养老的善治,需要精准识别、供给、管理、评估养老金储备和服务资源,并以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等为监督依据,推动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科学化、常态化和专业化^[13],提高养老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效能,实现现有服务资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

另一方面,在长寿时代,老年人蕴含着重大的生产潜力和消费潜力,是老龄社会的新型治理资源^[27]。老年期是职业经验积累最为丰富的时期,许多老年人在退休后还具有相当强的就业意愿与能力,且具备足够的健康条件和经验技能^[28],还可以承担家庭角色,提高子女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29]。因此,应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权利交由老年个体,消除有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就业和重返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平等的再就业环境与条件,促进老年人以灵活、弹性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生产^[7],拓宽老年人的活动场域和生存空间^[19]。而养老产业独有的服务属性和市场属性耦合^①,能够弥合人口老龄化加速和经济转型乏力的困境,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首次将养老服务列为三大重点消费领域之一^[30]。伴随着我国第二次出生高峰期人口逐渐步入老龄期,这些成长于改革红利时期的老年人,经济资本积累更加丰厚稳定,主要生活来源也从家庭代际支持转为退休金和养老金,或将成为夯实社会财富储备、拉动老年消费与投资、推动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4]。中国式养老应抓住老年人需求结构转变的市场机遇^[9],在文化娱乐、健康医疗、旅居养老等方面培育银发经济的新增长点,带动房地产业、保险业、旅游业、娱乐业等一系列上下游产业,创造新兴就业岗位和生产要素,拉动社会消费和内需增长,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产业空间^[10]。

此外,我国在经济架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家庭伦理等方面的资源禀赋与优势,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多元工具。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具有强大的计划、组织和配置能力^[8],在纵向上能够提升国家对地方政策的指导性和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横向上则保障同级政策工具的协调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为实现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式老龄治理提供可能^[19]。我国的广阔地域和区域多样性为中国式养老提供了充分的政策腾挪空间和创新试点机会,有助于各地方依据自身情况安排涉老制度与政策,自主形成更加多元、灵活的整体性治理体系^[10]。孝老敬老的家庭伦理和邻里互助的文化传统则奠

① 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事务,既有公共属性也有消费属性,具有公共属性的养老事业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具有消费属性的养老产业则是共同富裕的外在衍生,即养老服务不仅局限于传统由国家主导的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也包括能满足老年人一系列养老需求的经济产业,而我国当前养老服务的消费属性凸显不足,需要激活潜在市场资源、精准发展养老产业。

定了中国式养老的思想观念^[31]，拓宽了老龄社会治理的文化资源格局，在中国式养老体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契合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先发老龄化国家在同等阶段所不具备的技术优势，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中国式养老提供了数字化治理工具。依托各类痕迹数据及其变动趋势^[19]，中国式养老能够以强有力的“数字底座”实现养老服务运行和管理的智能化，以及对老年人的赋权增能^[26]，为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文明注入更加丰富的数字化内涵^[14]。

同时，中国式养老是涵盖政府、市场、社会、家庭、个体等多方责任主体的系统工程。养老资源的分配和对接涉及民政、卫健、发改、老龄、人社等多个部门，但不同部门的责任范围与认知有所差异，民政部门侧重于保基本、兜底线，卫健部门侧重于以医养结合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发改、财政、商务等部门更关注银发经济的培育。从各自职责出发来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将不可避免地降低沟通效率、造成资源浪费，制约了养老治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进程。中国式养老应转变传统的、单一的养老服务模式，明确各主体的功能定位和权责边界，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统筹协作^[13]。其中，党发挥理念引领、制度创设、规划布局的领导作用^[32]，政府在中国式养老中处于元治理的地位，承担制定政策法规、资源协调、监督管理等责任，并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提供公共设施、财政投入等方面的支持。企业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社会组织则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多元化产品与服务。家庭和个体作为中国式养老的基本细胞^[8]，应树立积极主动的养老观念，进行充分、全面的资源与思想准备，最终形成党和政府统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配合、个体和家庭参与的工作格局^[19]，实现良好的养老服务生态和养老共同体的综合治理^[5]。

最后，我国作为地域辽阔的人口大国，老年群体的异质性不仅表现在人口学层面的年龄和队列差异上，也表现在因成长背景、教育经历、工作性质等导致的禀赋差异上，以及不同地域经济社会条件和养老服务架构的资源差异上。因此，中国式养老的治理模式需要从全面扶持培育向有序重点发展转型^[8,33]。在注重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按照差异化的养老需求结构，统筹调节资源配置格局，区分面向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照护服务与面向一般性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精准回应不同队列、不同地区、不同禀赋的老年群体的特定养老需求，避免只关注共性需求的“一刀切”倾向。同时，加快实现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城乡养老问题治理的一体化，解决资源供需不匹配、资源紧张与浪费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提高养老服务的均衡性和公平性^[10]。各地区也应在国家标准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推进针对性、特色性的养老探索和试点工作，以提高本土能力为基础，因地制宜构建多样化的养老治理模式，寻求内生资源和外生资源的有效链接，开辟养老服务的新形式、新路径^[19]，将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与机遇^[33]。

五、推动中国式养老可持续的转型进路思考

从先发国家的规律来看，当老年人口增长到一定水平时，人口年龄结构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应地，社会经济要素的组织和配置在被调整、重建后，会逐渐形成新的平衡^[14]。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和负担，年龄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与社会现行运作机制之间的错位才是关键障碍，老龄社会的独特表征及其与经济、政

治、文化领域的多重张力,对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3]。为实现中国式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应将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中思考与布局,从全人、全代际、全社会、全要素出发,构建协同高效、系统融合、形式多样的新型老龄治理格局。

个体层面上,随着老龄化成为我国社会的新常态,中国式养老在未来应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社会参与、价值实现等多维度的生活福祉和生命质量。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多支柱、全覆盖、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养老、长期护理、医疗保险等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积极推动智慧康养等新型养老模式发展^[8]。另一方面,加快公共环境和服务设施的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场所和活动空间,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9],培育敬老、爱老、助老、孝老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尚,从自立自主、个人价值等多方面实现对老年人生活全过程的赋能^[19],强化老龄群体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最终建构老年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全龄友好型社会^[14],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赋予老龄化时代的新内涵。

代际可持续层面,中国式养老并不仅仅是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和公共服务,而是涉及不同代际的全龄问题。从人口生命周期来看,不同年龄群体通过相互支持和补偿来实现总体发展:老年人曾经是参与劳动的年轻人,为社会保障的财政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当下的养老金均衡和养老服务供给则依赖于中青年劳动力的生产生活活动,中青年群体未来也会成为需要被照料的老年人,对其的健康投资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问题,不同年龄阶段相互关联,并有机嵌入在中国式养老共同体中。而生育政策、托育政策、教育政策、就业政策、退休政策等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政策也会影响养老服务的实施效果,需要将个体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年龄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协调不同年龄群体和人口世代的福祉^[11]。基于此,中国式养老应以群体公平和代际均衡为发展理念,回应人口年龄结构和政策制度体系的矛盾,对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全方位改革,促进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的融合,建立代际共融、互惠互利、老少同乐的社会^[10],在满足老年人口需求的同时,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发展和福利最大化。

除此之外,中国式养老不仅是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还是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方面的综合性议题^[34]。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养老体系架构是应对式的碎片化治理,尽管部分应急策略在缓解短期压力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中国式养老作为关乎新时期发展全局的战略实践,应以整体思维进行系统谋划,将其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变革的全过程。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关注老龄化社会下体制机制、经济产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发展契机,通过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整合,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社会保障、家庭支持等一系列政策制度体系,实现与其他领域的持续平衡和协同发展^[19]。同时,从共建、共治、共享的高度出发,梳理各级政府和各类机构的职权内涵、政策积累与发展目标,尽快实现在信息、资源、权责、决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10],并建立涉老部门间的支援体系和支持网络,形成跨区域的协作与统筹机制,提高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利用效率,从整体层面建立起完善、可持续的中国式养老治理网络^[32]。

老龄化还与城乡区域结构、家庭代际关系、社会劳动参与、卫生医疗保健等多方面紧密

关联,在推进中国式养老的过程中,必然要激活全要素来解决发展难题。制度要素方面,政府应积极调整甚至重构自身的角色定位,整合社会、社区、家庭等不同子系统的资源以形成合力,在多元共治中建立整体性支持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10]。人力资本要素方面,应积极开发和利用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加快培育与养老服务相关的照料、医疗、康复、护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7],助力个体的生产性资源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效益。金融要素方面,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替代率较低,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不足,应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8],夯实居民养老风险相关的财富储备。而新兴技术要素深刻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模式,为老年照料、老年健康、老年金融等产业形态创新提供了发展机遇。

六、结论与讨论

尽管从人口要素的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暂时阶段,但老龄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形态已发生根本转变。因此,中国式养老不应是一种应急和应时策略,而应是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融合,以增进老年人福祉、促进老年人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满足其经济支持、医疗健康、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并调整以年轻人口为基础的各类制度与政策安排,实现老龄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本同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将在老龄化常态化的语境下展开。中国式养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已经从传统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演变为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人口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综合治理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现老龄社会的整体应对,需以“全龄友好”代替“老年友好”,以“用老服务”、“为老服务”、“养老服务”代替单一的“养老服务”,从战略、规划、制度和政策等层面推动养老服务与时代变迁相适配、与生命周期相交融,让发展成果更充分、更公平地惠及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全龄友好型社会。

参考文献:

- [1] 育娲人口. 中国人口形势报告 2024 [EB/OL]. (2024-03-30) [2024-03-31]. https://mp.weixin.qq.com/s/HFVluQfgWdY4DjdBw4cq_Q.
- [2] 陆杰华,刘芹. 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 [J]. 人口与经济, 2021 (5): 13-24.
- [3] 胡湛,孙昕. 反思中国式养老的“立”与“破”——基于家庭和性别的视角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3 (4): 10-18.
- [4] 陆杰华. 国家治理视域下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J]. 人口与经济, 2023 (1): 1-7, 25.
- [5] 胡湛. 家庭建设背景下中国式居家社区养老模式展望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11-17, 129.
- [6]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summary of results [R], 2022.
- [7] 原新,张圣健. 长寿时代老年人的年龄重构及退休政策调整 [J]. 人口与经济, 2023 (4): 124-136.
- [8] 杜鹃,王飞. 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 [J]. 社会建设, 2024 (1): 3-23.
- [9] 杨菊华.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 (3): 2, 14-26.
- [10] 胡湛,彭希哲.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治理选择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2): 134-155, 202.
- [11] 邬沧萍. 构建中国特色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J]. 人口研究, 1999 (1): 24-35.

- [12] 顾耀德. 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和养老方式的多元化 [J]. 人口学刊, 1997 (1): 21-25.
- [13] 陆杰华. 构建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探究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3-10, 129.
- [14] 李程骅, 张钊. 中国式现代化与老龄社会文明建构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2): 1-10, 241.
- [15] 人民网. 习近平谈家风建设 [EB/OL]. (2020-07-22) [2024-03-3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722/c1001-31792411.html>.
- [16] 杨善华, 贺常梅.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 71-84.
- [17] 牟来娣, 张旭升. “80后”城市青年精神赡养观念与行为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5 (3): 19-25.
- [18] 人民网. 习近平: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B/OL]. (2016-05-28) [2024-03-3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28/c1024-28387123.html>.
- [19] 刘智勇.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观念更新、任务定位、实现途径 [J]. 学习论坛, 2023 (1): 81-88.
- [20] 邬沧萍, 徐勤.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0 (2): 12-17.
- [21] 中国社会报. 探寻中国特色老龄社会治理“良方” [EB/OL]. (2020-01-06) [2024-03-31]. <https://www.mca.gov.cn/zl/n1128/n1247/c89920/content.html>.
- [22] 陈友华, 孙永健.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研究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 (5): 2, 5-16.
- [23] 代志新, 杜鹏, 董隽含. 中国老年抚养比再估计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再审视 [J]. 人口研究, 2023 (3): 94-107.
- [24] 穆光宗. 成功老龄化: 中国老龄治理的战略构想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3): 55-61.
- [25] 陆杰华, 阮韵晨, 张莉. 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探讨: 内涵、主要障碍及其方略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5): 40-47, 145.
- [26] 杜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 [J]. 人口研究, 2022 (6): 17-22.
- [27] KERSCHNER H, PEGUES J A M. Productive aging: a quality of life agenda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1998, 98 (12): 1445-1448.
- [28] 李连友, 李磊. 构建积极老龄化政策体系释放中国老年人口红利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 (8): 21-25.
- [29] 杨成钢, 孙晓海. 老年人口影子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J]. 人口学刊, 2020 (4): 30-41.
- [30] 新华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EB/OL]. (2022-12-16) [2024-03-31].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2/16/content_5732408.htm.
- [31] LEE A E Y. Family social support patterns of the Chinese elderly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Los Angeles: the role of filial pie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18-120.
- [32] 杜鹏, 王永梅.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老龄化的社会治理——成就、问题与现代化路径 [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 (6): 13-22.
- [33] 杜鹏, 武玉. 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路径、动力机制与未来转型 [J]. 中州学刊, 2023 (3): 2, 82-90.
- [34] 林宝.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内涵、目标和任务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 (3): 42-55, 127.

The Realistic Position, Key Issues and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hinese Elderly Care

LU Jiehua^{1,2}, GU Yuchen²

(1. China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entering a new developing stage, the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tensions with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lderly care system; Thus, Chinese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proposi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localization, Chinese elderly care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aging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key point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in an aged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China'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opulation elements, cultural traditions, social system and development stage hav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face both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imilar problems fac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special problems in China's localization.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elderly care and those of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 terms of target, value orientation, basic units, time dimen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elderly care to better adapt to the new form of aged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and innovate the releva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terms of governance basis, governance concepts, governance resources, governance tools, governance subjects, governance models, etc, using institutionalized policy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best bala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ests and equal development for all ages. Thereby, we should build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of Chinese elderly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ole person, overall generations, entire society and total factor, and establish a friendly society for all ages with intergenerational harmony,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Keywords: Chinese elderly care; governance of aging; localization of elderly ca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爱华]